

論孫子『始計』慎戰思想 對我戰略指導之啓示

空軍備役上校 謝之鵬

提 要

- 一、《孫子兵法》以「始計」為始至「用間」為止，將用兵中的各個環節，論述細密而周全，其戰略思想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為最高指導原則，而此一思想，乃源自中國傳統「慎戰」戰爭觀。
- 二、「始計」篇為孫子戰爭和戰略思想綱領，除說明孫子對戰爭看法，並提示未戰前預判勝負五項要素和七個基本條件，以此作為分析比較敵對雙方勝算依據，並特別指出攻勢重點應指向敵人「無備」和「不意」之處，是故全篇重點即在於強調「慎戰」。
- 三、國家戰略指導是以「慎戰」為首要，主要包含從慎戰、弭戰到「非危不戰」的戰爭與和平指導；其次是「經之以五事」，建立綜合國力，以從事戰爭準備之作為；最後則是為戰爭指導創勢，俾能以不戰而屈人之兵。其指導理則，概以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動；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為重點。

關鍵詞：慎戰、不戰而屈人之兵、五事七計

前 言

孫子，名武，字長卿，春秋齊國人，概與生於西元前 551 年，卒於西元前 479 年的孔子為同時期人。齊景公 16 年齊國發生變亂，孫武離開齊國遷徙至南方新興的吳國，潛心研析中國古代兵書，編撰《孫子兵法》，

並與伍子胥結交成為好友，後經伍子胥推薦於吳王闔閭而被重用，協助吳國建軍備戰各項準備事宜，之後於協助吳國伐楚大獲全勝後，即放棄封賜功名爵祿選擇隱退生活（約西元 505 年），以致孫武其爾後事蹟，史實難以考察^①。隨 1972 年於中國山東臨沂縣銀雀山上出土之漢代古墓遺址，《孫子兵法》

註① 依據漢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中有關孫子吳起列傳記載，孫子兵法一書為春秋時人孫武所著，經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切，而開注解先河，已毫無疑問。然其人其事為何，則眾說云云。本文以孫子後人清陽湖人孫星衍說法為主。至於其它可能說法及質疑部分，請參閱魏汝霖，孫子兵法大全（台北：黎明文化，2000 年 9 月），頁 347-364。

原稿竹簡殘片出土後^②，孫子學說與其事蹟乃更為世人所研究與重視。

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出席中華孫子兵法研究學會「全勝論壇」專題演講時，曾提出孫子兵法雖然只有六千多字，僅十三篇。但如果把它僅僅限於軍事戰術、戰鬥的方面，那就不是真正瞭解孫子兵法的層次，其最高戰略層次包括了各個階層；它運用在軍事行動當時，文字雖然很簡要，但是它包括的層次卻是非常的完整^③。從體裁上觀之，該書所記述之原則學理，格局宏大，意圖深遠，且見解精闢，對戰爭形勢變化的掌握與戰略、戰術運用，有一完整獲取全面勝利的謀略。是故，至今除仍是我們中國重要兵學典籍外，西方國家的諸多軍事學府亦一再印證孫子兵法的理論。所以孫子可當稱為世界性兵學家，其在兵學的地位上，與西方兵聖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約米尼（Jomini）、馬漢（Mahan）等西方兵學大師相較是不遑多讓，且其兵學思想亦對中西後世戰略發展產生一定影響。

本文冀從孫子兵學思想及對後世戰略影響為起點，進而漸次探討其「始計」篇慎戰與「不戰而屈人之兵」、「安國全軍」之戰爭指導，乃至如何運用形兵造勢贏得戰役，而達國家總體戰略思想作為，以期探究於當代不同歷史時空環境下，孫子兵學與慎戰思想的時代性與戰略啟示。

孫子兵學思想與影響

一、孫子兵學思想概述

由中國古代軍事理論形成而言，它不限於兵學家之作品，很多包括於哲學家與政治家之作品中。例如像法家（富國強兵；軍功、法治及重勢、重術與重法）、儒家（足食足兵；仁愛思想、戰爭不義）、道家（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反對政治制度與戰爭，強調順天之道與哲學辯證、柔能克剛和弱能勝強）及其它相關學派著作，均或多或少包含有軍事哲學，因此，對古代兵學家具有很大影響。

《孫子兵法》的理論除了受到道家的影響外，事實上也含有濃厚中國人道主義色彩。例如，孫子言兵，特重五事，而「道」列五事之首，據此乃得令民與上同意，然後可以與之死與之生而民不為畏危。將此「道」原則用於對敵作戰，又特別著重「全」字，不以殺戮為能事。故有「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等語。為達此最高理想，避免殺戮，乃有「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用謀。孫子稱之為「善之善者也」。由此觀之，孫子思想可謂已融合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和價值觀精神^④。《孫子兵法》全書以「始計」為始到「用間」為止，將用兵中的各個環節，論述得細密而周全，其戰略思想以「不戰而屈人之兵」作為最高指導原則，這一戰略思想，實源自其

註② 丁肇強，孫子述要(台北：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頁2。

註③ 中華孫子兵法研究學會，「勝兵先勝的全勝思維」，華孫學刊，第2輯（2007年12月），頁9。

註④ 田震亞，中國近代軍事思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2月)，頁33。



戰爭哲學思想。而達成「不戰而屈人之兵」目標，主要是以創勢為主軸，其手段則在於謀略戰與情報戰的結合。孫子戰略創勢的四大謀略理則為「奇正與常變」、「利害與趨避」、「虛實與攻防」、「輕重與緩急」，這些均帶有濃厚的哲學色彩，因此自然是運用之妙必須存乎一心。另其論兵思想乃以「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達成「安國全軍」為最終目標^⑤。整體言，其思想體系發展及各篇（章）的編排具有獨到邏輯與連貫性。就思想體系言，可分為四大段，第一篇到第三篇（始計、作戰、謀攻）為第一段。其內容大體屬於國家戰略（大戰略）層次，並將軍事戰略囊括其中成為焦點；第四篇到第六篇（軍形、兵勢、虛實）為第二段，為孫子對野戰戰略的完整論述，乃為將之道的精華與戰爭藝術的運用原則【註：野戰戰略於古代稱為用兵，西方則稱為戰區戰略層級(Theater Strategic Level)】^⑥；第七篇到第十二篇（軍爭、九變、行軍、地形、九地、火攻）為第三段，篇數最多，貫穿各個戰爭層次，涉及的層面更廣；第十三篇（用間）單獨構成第四段，把情報效能提升到戰略層面，揭

示了情報在戰略策訂與執行上扮演關鍵角色。

其次，孫子的戰略思想亦具「未來導向」與「行動面向」。當代軍事決策規劃若欲達前瞻與遠慮境界，必須先求「知」，舉凡先為不可勝、戰前準備、策略之運用、敵情研判及作戰部署等；倘欲使軍事行動更具效率和理性，則又須先知己知彼，知天知地^⑦，並善用戰略與謀略。尤其，孫子在其兵法中視「戰爭的政治、外交與後勤準備」、「作戰」以及「戰後的處理」為兵法不可分割的環節^⑧。其十三篇重要內涵概如附表。

二、對後世戰略發展影響

早在 1722 年西方文化尤其基督教東傳中國期間，《孫子兵法》亦隨西方傳教士引入西方各國。迄今業已被譯成二十幾種國家語言版本，其中美國英譯本為「戰爭藝術」一書，更是代表著西方對東方謀略的重要認知，更影響了西方戰略思想發展。美國松得爾恩評析孫子，認為其「兵者詭道也」，是戰略之祖孫子至理名言^⑨。另英國李德哈達（Liddell Hart）晚年對孫子更是推崇備至，在 1963 年為格里佛斯（Samuel B. Griffith）所新譯《孫子》一書時，曾指出《孫子》為世

註⑤ 陳福成，孫子實戰經驗研究(台北：黎明文化出版，民 2003 年 7 月)，頁 23。

註⑥ 孫子兵法有關作戰的理論，大致區分為「先知理論」、「戰勝理論」、「全勝理論」。野戰戰略(Field Strategy)的用兵思想融合了我國傳統兵學思想與西方兵學理論而成，其定義包含兩種意涵，一為承襲古代大軍作戰；二在實踐上亦同於西方國家「戰區戰略」(Theater Strategy)、「作戰戰略」(Operative Strategy)，參照胡敏遠著，野戰戰略用兵方法論(台北：揚智，2006 年 4 月)，頁 18-19 及 39。

註⑦ 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台北：麥田，1998 年 9 月)，頁 311-313。

註⑧ David Lai,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以中國圍棋剖析『勢』的戰略概念」，國防譯粹，第 31 卷，第 7 期，頁 71。(原 2004 年 5 月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戰略研究所刊出研究論文)

註⑨ 魏汝霖，孫子兵法大全，頁 366。

附表 孫子十三篇重要內涵

篇 名	現代軍事用語	重 要 精 義	重點強調
始計篇	國防計畫	決勝於廟堂之上	慎戰
作戰篇	動員計畫	兵貴勝不貴久	速勝
謀攻篇	國家戰略	不戰而屈人之兵	全勝
軍形篇	軍事戰略	勝兵先勝	先勝
兵勢篇	戰爭藝術	正合奇勝	奇勝
虛實篇	機動作戰	致人而不致於人	主動
軍爭篇	作戰目標	以迂為直、以患為利	智勝
九變篇	統帥學	為將之道	應變
行軍篇	用兵學	處軍、相敵、附眾	善慮
地形篇	地形學	修道保法	將道
九地篇	地略學	陷之死地然後生	齊一
火攻篇	核子戰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利動
用間篇	情報戰	知敵之情	先知

資料來源：參考丁肇強，孫子述要（台北：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頁9-14。

界上最古老的兵書，但在思想之淵博和深入程度上，從無後人能夠超越他。並認為「孫子眼光較清晰，見識較深遠，而更有永恆之新意。」最後還說：「《孫子》這一本短書所包括的戰略和戰術基本知識，幾乎像我所著二十多本書所包含份量一樣多」^⑩。同時，也提出：「在導致人類自相殘殺、滅絕人性的核武器研製成功後，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譯孫子這本書了。」而該譯本目前已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匯編的中國代表作叢書之一，成為近三十多年來具有權威性的孫子兵法英文本。

1991年英國作家詹姆斯·克拉維爾（1983年版英譯本《孫子兵法》作者）曾說：「如果近代軍政領導人研究過這部天才

的著作，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完全可以避免。」他認為《孫子兵法》的要旨即在於「戰爭的目的是和平」；另《大戰略》一書作者－美國學者約翰·柯林斯認為：「孫子是古代第一個形成戰略思想的偉大人物，...今天沒有一個人對戰略相互關係、應考慮的問題和所受的制約比他有更深刻的認識。他的大部分觀點在我們的當前環境中仍然具有和當時同樣重大的意義。」此後，美國戰略研究中心研究所主任福斯特，於1978年進而以「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為核心思想，提出美國對前蘇聯的新戰略。可見孫子理論亦對當今世界強國戰略決策發展具一定地位，並深刻影響著國際戰略格局調整與變化；另從1982年開始，美軍在作戰條令和

註⑩ 鈕先鐘，西方戰略思想史（台北：麥田出版社，1995年），頁474。

國防部重要文件中引亦用孫子格言的做法便成為一個不成文的模式沿襲下來。美軍新版《作戰綱要》更是開宗明義地將孫子「攻其不備、出敵不意」作為其作戰指導思想。

另從 20 世紀 70 年代末西點軍校將《孫子兵法》列為教學參考書開始，《孫子兵法》在美國軍事院校以及一些著名的大學中漸成普及之勢。目前，美國凡教授戰略學、軍事學課程的大學，特別是軍事院校，均將《孫子兵法》作為必讀教材和必修課。美國國防大學還將《孫子兵法》列為將官主修戰略學的第一課，位於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之前。惟除美海軍學院外，孫子兵法的研究在美國的軍事教育中只占極少的一部分，研究孫子兵法的人更是少而又少，通常孫子思想也許被納入其古東方歷史軍事思想有關課程，或整合於亞州軍事思想和實踐內容中，或整合在軍事理論策略的核心課程裏^⑪。例如美國國家戰院 2002 年戰略思想課程摘要中，將孫子與李德哈達思想歸為同一屬性，認為兩者對戰爭性質觀點為：戰爭是政治性

質－與政治相關連/國家最高利益/大戰略（Political nature of war/supreme interest of state/grand strategy）；聚焦於軍事武力間衝突（focus is conflict between military forces）；著重心理因素－瓦解敵人意志、而非摧毀敵人以贏得勝利（a psychological enterprise-win by disruption instead of destruction）而作戰手段上強調間接路線（indirect approach）、欺敵與奇襲（deception and surprise）^⑫。

「始計」篇與慎戰思想要義

一、「始計」內容概要

我國前三軍大學校長余伯泉上將認為孫子「兵者詭道也」乃是孫子對戰略所下的定義，並認為孫子「始計」為其國防戰略之大綱。另依蔣百里將軍觀點，「始計」篇概分五段，第一段敘述戰爭之定義，第二段建軍之原則，第三段闡述開戰前之準備，第四段敘述戰略戰術之綱要，第五段結論勝負之故。全篇主意，在「未戰」二字，言戰爭者危險之事，必于未戰以前，審慎周詳，不可徒恃

註⑪ 授課上通常將孫子思想與克勞塞維茲思想作比較，側重指出相同之處。但就重視程度，同為西方文化背景克勞塞維茲軍事思想在美國軍校地位與受重視程度遠遠高於東方孫子兵法，但仍重視孫子戰爭的政治性問題。例如，美國軍校參考書《戰爭的主宰》(Masters of War)一書作者麥克－海德爾(Michael Handel)在書中指出：所有戰爭都有相同特點。不管孫子還是克勞塞維茲，都同意政治對戰爭的影響，和政治家必須決定戰爭要在政治上達到什麼目的做出決定；皆同意戰爭是危險的和對戰爭決策要謹慎為之；都同意一旦戰爭爆發，軍事指揮官必須有較大的自主權而不受政治領袖的干預；都同意一旦捲入戰爭，必須用各種手段取得優勢，戰爭必須是短平快地解決掉；都意識到在精神上、道德上壓倒敵人可以更有效地取得最後勝利。而不同之處在於，孫子更傾向於開戰前，大量使用政治手段達到戰後軍事目的等作為。從戰爭看孫子兵法，<http://www.6000year.com/addhit.asp?id=62882&classid=2>

註⑫ 2002 年美國國家戰院戰略思想授課內容摘要表。

一二術策，好言兵事也¹³。

從今日戰略而言，其第一段「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不可不察也。」正如蔣公所提示「戰爭亦就是國防」，其關係國家存亡，國民生死，不可不慎。就此，相較西方相互沈重的打擊，我國傳統戰爭觀是講求和平自衛及合理價值為基礎的一種藝術與科學¹⁴。

第二段從「故經以五事……，五曰法。」至「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則勝，不知者不勝。」意即以「民本」為核心，營造全民戰爭與總體思想之先聲，並注意「天時」氣候的適應和時間爭取，及運用地形之「遠近、險易、廣狹、生死之道」一切空間，方能「計險扼遠近」來料敵致勝。在精神與意志上，則培養與磨練將帥「智、信、仁、勇、嚴」武德修養，發揚忠貞氣節之革命精神，進而透過健全軍隊編制，嚴正人事與後勤，建立堅實軍隊基礎。而前述「道、天、地、將、法」諸五事，乃戰爭勝負樞紐，為將者不可不知，真知力行方可操先勝之算。

第三段從「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吾以此知勝負矣。」至「計利以聽，乃為之勢……，因利而制權

也。」蓋「主有道」，則政治修明，然後「有能」，「有得」，「能行」，「有強」，「有練」，「有明」，而用兵乃可勝，反之則必敗無疑。而在瞭解與完成國防戰略大綱準備後，更須計算敵我之利害，並令部眾聽從之，然後配合外部如反間、外交謀略等手段，部署打擊敵人之有利形勢，依我利益所在形成重心，進而採取「奇正」「虛實」的權變之策，掌握先機。

第四段「兵者，詭道也。……。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本段圍繞在「戰爭藝術化」的精神，用兵雖本于仁義，然其用勝必在詭詐。用兵之奧妙，存乎一心，而要達成「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在方法上遂行各種欺敵作為，以及利誘、離間等相應手段，以達成「我可勝、敵不可勝」之境界。

第五段「夫為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此段總結全篇，言國家策定國防計畫後，未戰前從平時準備有素，而認為有必勝把握時，就是計畫完整周詳；反之，若認為無確勝之把握時，即是計畫不周詳。故平時計畫愈周詳，則勝利愈有把握，因此多算勝于少算，少算勝于無算也。由是觀之，國

註¹³ 魏汝霖，孫子兵法大全，頁55。

註¹⁴ 美國學者蒙特羅斯（Lynn Montross）所著《歷代戰爭一書》，對中國傳統自衛與慎戰觀，曾提出以下看法「中國古代文化保守主義，為人道動機所啟發的和平主義。……中國人對戰爭研究，向有興趣；但他們所研究的戰爭，與同時西方戰爭意識不同，西方的戰爭，是彼此相互沈重打擊。中國人的戰爭觀，則是各種合理價值為基礎，是一種藝術與科學。」國防大學，孫子兵法註釋（桃園：國防大學，2002年），頁2。



防計畫之良窳與否，實為決定戰爭勝負之基礎。

綜合前述，可知「始計」篇乃為孫子戰爭和戰略思想綱領，它除說明其對戰爭看法和態度，亦提示未戰前預判勝負的五項要素和七個基本條件，並以此作為分析比較敵對雙方勝算依據。這與今天「國家情勢判斷」相似，旨在強調「多算勝，少算不勝，無算必敗」，以告誡當時及後世，不可冒險發動沒有把握戰爭。同時，說明在戰略上，必須運用詭詐之方法，去欺騙和擾亂眩惑敵人，使其判斷、決心、計畫和行動發生錯誤，予我可乘之機¹⁵。

二、孫子「慎戰」思想要義

孫子始計篇首段即開宗名義提出「慎戰」論點，亦即明君對戰爭之事需廟算其勝與不勝，不可僅憑意氣輕率啟戰，並在火攻篇「慎戰」具體思維與限度—「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其次，則是在國家面臨「非危不戰時」，提出對國家情勢判斷，亦即於國家戰略目標與戰爭準備方面，需從建立經營綜合國力—道、天、地、將、法五事為度，審視民心意志、陰陽寒暑之天時，地域遠近與險惡、將帥領導與紀律法治、訓練士氣等，用以找出敵我之優劣、俾利戰爭準備時尋找出敵不意、超敵勝敵之道。

至於「創造與運用有利狀況」（創勢）

階段，概分「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及「兵者詭道也」等兩部分。前段大意是已完成建立綜合國力，從事戰爭準備的國略作為，且依國家情勢判斷有勝算把握並獲將領共識，乃即開始創勢（創造有利狀況），在我外在輔以「欺敵」或導誤敵人的作為，而這種「偽態勢」的創勢，須「因敵之利」制定創勢權謀。所以第二部分「兵者，詭道也」，戰略創勢即循詭詐出奇路線，導誤敵人；最後透過不斷的情報判斷之「廟算」來掌握「國家情勢」。故孫子在結語中要求「多算」，就是多判斷。並強調「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可見「國家情勢判斷」為「國家戰略」的重要作為¹⁶。

綜合而言，孫子的「慎戰」思想，就是儘可能避免戰爭，如「兵者，國之大事。明主慎之，良將警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以及「故經之以五事—道、天、地、將、法。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同時，孫子在戰爭指導上主張做好戰爭準備，也就是不打沒把握的戰爭，一旦發起戰爭則講求速戰速決，並儘可能講求靈活戰略運用及奇正之變，以獲得戰爭的勝利。

而具體實踐上，我們可從二戰後美國戰爭計畫包括了戰爭準備、動員計畫、戰爭遂行方案，與戰後計畫四部分作為觀之¹⁷。而

註¹⁵ 丁肇強，孫子述要，頁9。

註¹⁶ 李啟明，孫子戰略理則的現代戰史例證（台北：黎明文化，2007年5月），頁49-53。

註¹⁷ 周力行，世界軍事思想比較論（台北：黎明文化，2007年5月），頁160。

其目的，是期在達成國家之政策，舉國一致之作戰目標，亦即孫子五事之「道」。美軍策定戰爭計畫時，其立案假定包括：開戰日期選定（即孫子之天）；敵、友與我之形勢確定（即孫子之地與伐交）；國力。即孫子之法、將、兵眾熟強等戰爭能力；新武器之影響（對戰爭型態影響及科技工業通資能力）等，其精神同孫子全爭於天下之意。在戰爭準備上，美軍依照預想戰爭爆發時間可能之長短，經過遠中近程戰略情報分析完成戰略不同階段戰略情報判斷，進而完成各階段目標與計畫指導，這亦正揭示廟算先知與索其情的運用。

孫子慎戰思想對我之啟示

從孫子思想得知國家戰略指導是以「慎戰」為首要，而其主要任務包含從慎戰、弭戰到「非危不戰」的戰爭與和平指導；其次是「經之以五事」，建立綜合國力，以從事戰爭準備之作為；最後則是為戰爭指導創勢，俾能以不戰而屈人之兵。至於指導理則，概以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動；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為重點。不過在「慎戰」上亦強調須輔以有效的弭戰措施，否則單是「慎戰」並無積極意義可言。亦即仍須著重創勢指導—為戰爭創勢，包括「能而示之不能」，其中尚含有「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親而離之」，以及綜合的「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等多項創勢理則及「用而示

之不用」的創勢思維¹⁸。

從當代戰略指導階層而言，國家戰略階層應為戰爭指導樞紐。孫子所謂「廟算」亦即國家戰略階層的戰爭指導，而現代戰爭指導理則，依循孫子觀點乃在合乎「道」的戰爭指導。「道」是總體的，其整體分析至少應把握下列總體戰爭指導方面：儘量少用武力戰，多用政治、經濟、心理戰略，以達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標；有限戰爭指導方面：儘量維持有限戰爭，適可而止等理則。並把握「全國、全軍」、「兵不頓而利可全」，不使戰爭擴大；以及速決戰爭指導方面：「兵聞拙速」，故戰爭指導者應尋求儘早結束戰爭。即使在劣勢狀況下，不得不「持久」時，也希望避免無限制拖下去。欲達成上述戰爭指導目標，則必須運用謀略（詭道）創勢，取得主動權方克成功。謹結合前述思想及當前戰略環境與形勢，針對我國戰略指導發展提出以下看法：

一、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

戰爭雖攸關國家民族存亡，賢君不可不察，但也不能沒有從事戰爭可能之準備，主要仍以利為「安國全軍」考量。「非利不動」亦即當國家面臨戰爭威脅時，經國家安全情勢判斷後，如權衡當前國內外情勢，認為合於我利則動（開戰），而其利害分析通常本乎以下因素：第一，敵我總體國力之對比；第二，不為近（小）利害所惑，而失去遠（大）利害的掌握契機；第三、「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可運用程度；第四，國際情勢的

註¹⁸ 紐先鍾，孫子三論-從古兵法到新戰略（台北市，麥田出版，1995年），頁37。



演變等因素之深入考慮。如情勢分析不利於我則寧可不動以待機；「非得不用」，乃若非判斷一旦用兵開戰，必能獲得戰爭目標或國家目標，決不用兵而採其它手段為之；「非危不戰」，亦即非正義之戰不戰，「非到危急存亡之秋不戰」，也是「非師出有名不戰」。

對照中共當前戰略決策，即常以前述觀點來審視評估其戰役發起，其考量核心則在於先形塑其國家安全條件：亦即共黨掌握政權之穩固、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以及中共獨立自主發展必須等。一旦危及前述重大利益，則進而對消弭此等威脅所需遂行之戰役實施價值評估，這評估除戰爭行動成功公算外，並對戰役在軍事上造成的直接結果（尤指殲敵有效戰力能力）；戰役對中共下一項戰略作為（包括下一場戰役之影響）；戰役對敵心理、政治、經濟及內部關係所造成影響；以及戰役在提升維持或減損國家領導人掌控「大局」能力所扮演的角色等實施決策分析。因此從中共軍事思想與決策出發，在面對當前中共威脅，我們除應明確我利益所在外，更必須明確敵之意圖（尤其國家利益及政治意圖）、盱衡敵我戰略相關要素發展形勢，找出敵我利害關鍵所在及主客觀限制因素，進而從建立我可行戰爭思想與軍事理論，來優化及指導我國防及全民防衛方向，以期使敵無「出師之名」或「可乘之機」，進而促使敵於理性評估風險下，不致貿然對我發動戰爭，爭取蓄積國家實力與國防現代化之契機。

二、以「五事」建立國力

所謂五事乃「道、天、地、將、法」。其中「道」是無形力量，是國家基本政策，立國精神。先總統 蔣公認為「道」是政、經、心、軍之建國理想，為綜合國力建立指導方向，亦即「國家目標」，戰時更是融合全國民心的「奮鬥目標」，是「為何而戰」之答案。針對國家戰略所指導方向（基本政策與立國精神），若能使人民認同（為何而戰），則上下一心共同朝「奮鬥目標」實踐，必能使無形力量轉換為有形力量。而於面對敵人不畏危險。因此，如何從國際與敵我情勢分析中，確認國家利益（尤其安全利益）凝聚向心，是繫於能否明辨利害，棄小義換大利。「將與法」是力量，是建軍問題。以從事戰爭準備而言，建軍是圍繞在綜合國力核心問題，也是重要一環。而軍事力量建立運用，是將帥武德與智謀或智略問題，是以「智」為先進而重信、存仁（忍）、無懼且嚴明。亦即在一能具宏觀視野判斷之智慧前瞻下，有效確立正確目標，把握正確方向，領導軍隊邁向成功之道。而其關鍵在一位將領面臨複雜而危殆情勢時，能否分析情勢，明辨利害，掌握關鍵，立即提出正確決策或下達決心，並在卓越領導下循序完成軍事政策、制度等有形軍事力量建立，以達成戰爭準備作為。「天、地」乃時空問題，含括作戰地區天候、時令，地域空間大小險惡等重要問題。戰爭準備，必須依預想戰爭型態，儘早做「戰場經營」，與「後勤」整備。尤其是我防衛作戰，更需針對其利害分析，用其利而避其害，或以害為利，反其道，出敵不意運用之。因此戰爭直前應比較敵我雙方

戰略現況（即經營道、天、地、將、法，以從事戰爭準備）的國家情勢判斷，進而找出敵我雙方優劣，以指導戰爭準備中之超敵、勝敵之道。並持續不斷從我前述建立成果及對相應敵此等之能力情報蒐集，透過「道、將、天地、法令、兵力、訓練、賞罰」等七個因素實施更具體比較，以判斷一旦戰事開啟我之成功公算為何，進而知可與敵戰或不戰及尋求其它彌補方策，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力求消弭戰爭、維護和平。

簡言之，戰爭準備要考慮「道、天、地、將、法」。從現代角度而言道是戰爭目的；天是天時地利；將是指揮官的人才；法是一切的制度。這個制度不光是所謂軍法，法令，法是代表一切的軍事制度；從人事制度，補給制度，裝備制度、保養制度，採購制度，一切管理的制度。而在這個前提之下準備戰爭：才能達成所謂「勝兵先勝而後求戰」的目的。其重點亦即是如何預判未來的戰場、戰地，另外還有武器、裝備、戰爭的形態。這就是所謂建軍的思想。始計篇就是要確定建軍要朝那一方向走？其次，軍事思想方面應包括國家面對的戰爭要怎麼打法！勝敗決勝的關鍵在那裡！把這兩因素掌握住，再進一步看看敵人是怎麼做、怎麼想的，然後做一比較，誰勝誰敗，在還沒有開打之前，就已見分曉。

當前我們建軍發展主要即在創造「勝兵先勝」契機，而關鍵則在發展具有先制、先進與創新的策略。孫子之「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就是這個道理，所以孫子不是暴虎憑河以匹夫之勇打仗，尤其

站在國家階層、高階層必須非常慎重絕不隨便輕啟戰端的。要打就要打有把握的仗，且這個勝利還要全勝；所以孫子是以「全國為上，破國次之」，最好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就是要在戰爭的準備過程當中，形成各種戰略的優勢；然後在這各種戰略的優勢指導下，獲得勝兵先勝的契機。

從歷史教訓來看，冷戰時期的結束正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好例證。二戰後，以美蘇為主的兩大集團，雙方都擁有毀滅性的核子武器，進行所謂武器競賽。七十年代冷戰高峰時期，隨時有一觸即發的毀滅性核子大戰。然最終前蘇聯在軍備競賽中因經濟因素拖跨下而導致政權崩解，也結束冷戰對峙。這種在軍備競賽中以戰略優勢，迫使敵人也以相同的花費來從事軍備競賽；而在雙方經濟能力相差懸殊下，不戰而屈使敵人敗亡，這就是孫子「不戰而屈人兵」的最高用兵思想。因此，吸取過去歷史教訓，審視現在兩岸安全環境與戰力形勢無法對比之下，如何藉由國家戰略整合及指導，揭示最符我全民利益及國家生存發展之我遠、中、近程目標，進而導引政治、內政、外交與國防等共同建立各階段之「先為不可勝」態勢努力，俾於戰爭無法避免時，藉掌握我有利契機與作戰態勢達成以「待敵之可勝」目標。

三、國力運用－以奇創勢

國家戰略階層重點主要植於為「慎戰與弭戰」創勢，以及為戰爭遂行創勢，以期能於「終戰」後獲得較好和平。此種造勢，要因敵之利而制訂權謀，除我方之利更需善用「奇」、「正」因敵之利，而創造出敵意表



之勢。這主要在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各種戰略「詭道」運用，以及軍事戰略或政治戰略上採取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等，來達成「出奇不意、攻其不備」的奇襲態勢。是故，從當前國家戰略指導作為言，如何將政治目的透過戰略手段評估、分析，進而得出最佳行動方案，掌握「勝兵先勝」之道，為一重要課題。

檢討過去國共戰爭教訓，毛澤東思想是將國際情勢與趨勢變化的掌握置於其戰爭理論研究的中央位置。其精髓即在為達成持久戰略，須於真選時空與有利條件下，使敵陷於進退兩難；並適時由守勢轉換為攻勢作為(由游擊戰、撤退戰轉換為機動作戰)¹⁹。而其微妙處就在攻守勢轉換(Transition)時機的啟動與全般態勢的運用。毛氏則依據戰爭實際情況，逐漸發展其革命勢力，在戰略上採取內

線的持久防衛線，另一方面在戰役、戰鬥上則進行外線的速戰進攻線，選擇有利戰機，集中優勢兵力，實施各個突破與襲殲，以此消耗與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發展壯大自己力量，逐漸轉變戰場力量對比與攻防形勢²⁰，並依此成功掌握「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策略而擊敗當時國民政府軍隊²¹。

是故，借鏡美國國家軍事戰略規劃程序，我們亦應從界定我國政治目標為起始，即從地緣戰略發展檢討與規劃軍事戰略為基礎起點，並對政治所望目標進行瞭解及分析；再依次就軍事目標遂行選擇，亦即戰略階層瞭解軍事武力應如何配合其他國力工具一致運作，以達成政治目標。並分析該等目標如何應用在和平、危機及戰爭，以及更重要的是，它們之間轉換的問題，來決定軍事力量如何運作，及其應達到何種程度；進而依前述找出我國、盟邦、及中共的重心所在。即確認當前戰略重心(identifying center of gravity)，以提供為軍事目標最佳發展途徑；

註¹⁹ Michael I Handel, "Clausewitz and Mao Tse-Tung 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War," Masters of War Classical Strategic Thought (Portland,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1), pp.42-43.

註²⁰ 參考《中國大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9年5月)，頁100。

註²¹ 1946年毛澤東依據當時形勢，下達「以集中兵力打運動戰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擊戰為輔。而在蔣軍武器加強條件下，我軍必須特別強調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指導下，使國民政府對其發動攻勢無法奏效後，整個形勢已明顯不利於國民政府，除紅軍已由戰爭前120萬人，發展到195萬人，且正規軍發展到1百萬人以上可運用於機動作戰外，裝備與士氣也大幅提昇，同時也為其後續轉入戰略攻勢建立有利態勢。後續並藉由戰略機動與牽制有效掌握戰場主動，於1948年8月起集中主力逐次發動對東北、華北等地國民政府軍隊遂行戰略決戰，並於1949年1月即獲得戰爭之決定性勝利。參考中華孫子兵法研究學會，「勝兵先勝的全勝思維」，華孫學刊，頁13；國防大學，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1月），頁549-612。

最後則將所決定的各種任務整合至軍事欲達成目標規劃上，再透過戰略的方法與手段間平衡、比較作為來檢視敵我軍事能力與弱點，並將軍事所望目的與手段相連結成為戰略構想，並慎重決定優先次序及資源分配。同時確立軍事目標建立優先次序以及在軍事作戰每一階段，決定如何運用可用兵力，來構成軍事計畫核心。並需持續對此戰略構想、參與兵力、及期望與可能結果，作全程嚴密的政治與軍事利益、成本與風險分析與檢試之評估，進而針對前述構想找出戰略風險予以補強，以確保我行動之成功公算。

而此種思維程序，所圍繞與關鍵核心，正如孫子揭示從慎戰、弭戰到「非危不戰」的戰爭與和平指導（國家利益、目標）為始；再「經之以五事」，透過國家戰略整體指導軍事建軍與野戰用兵準備，以從事未來戰爭準備作為；進而於開戰之時，依據完整軍事判斷、計畫與欺敵、謀略等作為指導來創造有利之先勝之勢，俾達不戰而屈人兵。

結語

當前我面對之敵人中共，不論其國家實力或戰爭準備遠遠超出我國，且在戰爭與作戰思維發展上，已有大幅精進。這可從，中共除關注西方戰爭原則或思想脈動外，並全面研究孫子兵學思想，進而結合其本身特點與能力，使傳統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及「致人而不致于人」等戰略思想，得以內化為其戰爭與戰役之實用思想等作為觀之。

是故，未來如何強化我國對孫子兵學思想之戰略實用性研究及藉由其來研析中共相

關戰爭作為與指導外，更應吸取過去經驗與教訓，從當前戰略環境中，透過明確的國家戰略目標指引，依據情勢與能力分析找出最符國家利益與能力之全般作為，進而提供具體可行的軍事目標，以勾繪未來結合國力與軍事力量共同努力之遠、中、近程具體建設方向，俾利於支持當前「能戰而不求戰」的目標，進而達成追求「不戰而屈人之兵」、「安國全軍」之道，仍待未來持續從國防政策、戰略以至用兵思維等方面廣續精進與深入之研究。

作者簡介

謝之鵬先生，備役上校，空軍官校 70 年班、戰院 87 年班、戰研所 94 年班、政大外交系碩士；曾任職於國防大學戰爭學院教官，研究領域為中共軍事，軍事戰略及戰爭指導。

敬請

踴躍投稿

1. 相片稿件：有關本軍靜態及飛行間之圖片。
2. 文字稿：有關本軍建軍發展相關研究之論文。